

前段时间，我有幸聆听了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老师的讲座。他推荐了一本关于二战的书——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《战争中沒有女性》。这个书名一下子吸引了我：战争中沒有女性？可战场上明明有那么多女护士、女战士啊？我迫不及待地去市图书馆借来了这本书。

翻开书页才明白，作者S.A.阿列克谢耶奇写的正是战争中的女性。她以口述历史的方式，记录下被历史长期遮蔽的女性视角，不是因为女性不在场，而是她们被迫隐藏起自己的性别，活成了“男人”。为了保卫祖国，苏联几乎把所有适龄男性送上前线，无数年轻女孩也怀着炽热的爱国之心自愿参军。她们做护士、狙击手、坦克手，穿男装、干男人的活、打男人的仗。在烽火连天之中，性别差异被残酷地抹去了。

战争是什么？男人眼中的战争或许关乎荣誉与战斗，而女人眼中的战争，却更多是关于痛苦与失去。读这本书，我不止是“感动”，更是被深深“震撼”。阿列克谢耶奇笔下的战争，太真实，也太残忍。我能理解诺贝尔文学奖，为什么会颁给阿列克谢耶奇，因为这本书，是用生命来撰写的。她不是在书写战争，而是在用生命对接生命，用记忆唤醒记忆。

我常常读着读着，就忍不住落下泪来。合上书，胸口像堵了一块巨石，抑郁难解。那些血与火的故事在大脑中反复回响——我也从未像此刻这样，痛恨战争的发起者。

书中的描写太真实，感觉自己像是跟着这些被采访的女子，经历了这场血淋淋的战争。书中有太多情节让

我难以忘怀：有一位指挥官，女孩们都觉得他非常严厉，不近人情。然而战争之前，他还是一位普通的数学教师。一位炊事班的女兵把粥熬好了，可是等了很长时间，都没有战士回来吃。原来出去打仗时，人都好好的，可是一场战争下来，基本上都牺牲了。

有一位女护士记得，战争期间，经常为了保住伤兵的性命，只能截肢。简易的手术台后面，有一个大盆，盆里面装着很多锯下来的肢体。有一位军官，送受伤的战士来到这儿，看到了这些，当时就遭受得晕厥过去。那些被炸飞手脚的伤兵，只要还清醒，就拼命要找回落下的肢体——他们是想要“完整”地离开这个世界。一个小女孩，脚很小，却穿着43码的男人鞋子（战争中所所有发的装备，都是男性的尺码）。行军的路上，她走得很慢，领导很生气，催促她快点。她刚打算多迈几步，结果一不小心摔倒了，鞋子直接飞了出去。这时候，旁边的战友才发现，她的脚全都被磨破了。

小姑娘们生理期来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卫生用品可以用。纱布在战场上，都是急需的物品。行军的时候，她们经常一边走，一边裤管滴着血。一位讲述者说，半年以后，在这种高度紧张、条件极端恶劣的环境下，她已经没有生

理期了。战争结束后，很多才20岁左右的小姑娘，就失去了生育能力。 即便在这样的地狱里，女孩们依然渴望望、渴望生活。她们会偷摘野花，晚上放在床头；会在深夜戴上珍藏的耳环入睡。她们不是不怕死——死亡太常见了——但她们更想活着。不管处于什么样恶劣的环境中，女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都不会消失。

但更让人心痛的是，许多女兵即便熬到战争结束，仍长期被噩梦纠缠。身体虽然离开战场，但心却从未真正离开。书中描写：有一个女兵，战后回到家。她家附近有一个矿场，经常需要爆破。每一次，只要有爆炸声，哪怕夜里睡得很熟，她都会条件反射般立马从床上跳起来，一把抓住外套，拼命往外跑。这时候，她的母亲总是死死拉住她，反复告诉她：“战争已经结束了。”

另一个故事同样让我心痛。游击队需要炸毁德军一处设施，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一位母亲提议可以让她七岁的女儿去，因为德军对孩子有时会放松警惕。她把炸药藏在盖着孩子衣物的篮子里。任务成功了，但母亲也永远见不到女儿了。

暑假里，我带小宝上体能课。有一次，她在上课，我在旁边读这本书。正好看到这个情节，小宝突然跑过来：

前不久，笔者利用休息时间赴贵州独山县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参观，在纪念国共两党抗日英雄的“万魂墙”上，看到了一位安徽籍卓著烈士的匾牌：张学文，1915年出生，安徽霍邱人，1931年参加红军，曾任红军团长，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游击支队副队长，1943年7月24日在安徽盛家桥牺牲。

据说，这是全国唯一一家对国共两党抗日英雄记录最全的纪念馆。据查阅相关资料和到多个部门认真考证，张学文牺牲时所在部队是新四军第七师。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后，根据党中央命令，新四军第七师正式宣布建立，张鼎臣任师长，曾希圣任政委。这支部队是由“皖南事变”突围部队、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和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三支部队编组而成，下辖四个团和几个独立大队，约2000人，到1943年初，部队已发展到6000多人。

张学文1931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，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多次反“围剿”作战，后随军北上入川，参加创建川陕苏军根据地斗争，并担任长征，曾任红军团长，功勋卓著。抗战初期，张学文奉命由延安派回安徽，先后任无为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、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兼第三大队大队长。1940年转入淮南抗日根据地，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十三团团长等职。1943年春调回皖中抗日根据地，任新四军第七师巢湖游击支队副支队长。

1943年三四月间，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决定对新四军第七师巢无中心

根据地两次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，妄图一举消灭第七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。在两次反扫荡斗争中，第七师各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，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，缴获步枪500多支、轻重机枪14挺，粉碎了日寇的万人大“扫荡”，取得反扫荡斗争的伟大胜利，张学文等众多将士荣立战功。

日寇两次“扫荡”，妄图消灭我新四军第七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阴谋失败了，又玩弄新花招，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，心照不宣地搞日蒋联合军事行动。1943年7月24日，日寇突然从白湖的两端黄姑垭、盛家桥两个据点撤退，使我巢无中心根据地暴露在大别山国民党反共顽固军面前，让桂系顽军向我疯狂进攻。在这次战斗中，第七师一部损失惨重，张学文也壮烈牺牲，年仅28岁。张学文，一位很早参加红军，曾经先后担任过多个要职的我军抗日名将，多次打敗日军，为国雪耻，最后竟倒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。

“北有卢沟桥，南有深河桥”。我们一行吊唁者，立于“万魂墙”前，向国共两党抗日英烈们鞠了三躬，并对着回音壁高喊：向抗日英雄们致敬！喊声在喀斯特地貌里的山谷中久久回荡……

“愿以我血献后土，换得神州永太平。”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愿英雄不朽！

天下太平，本意是全世界平静无事，大多理解为社会安定，天下平安。太平盛世则是指社会长期的和平、繁荣。因此，历朝历代把“太平”用作地名、人名，甚至当作年(国)号也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
把“太平”当作年(国)号的封建帝王，起初的愿望也是希望社稷稳定、生生不息，但往往是事与愿违。十六国时，鲜卑贵族首领元丕不满南燕的奴役压榨，在山东起兵，于公元403年建立大燕帝国，自称太平皇帝。据《晋书·卷一百二十七》载，太平皇帝在位仅半年多时间就成了南燕慕容皝的阶下囚。想要建立一个太平国家是何其艰难也。

隋末江西鄱阳人林士弘，对隋炀帝的大兴徭役、横征暴敛早已恨之入骨，于公元616年起兵反隋，自称南越王，后称帝，国号“楚”，定都豫章，年号“太平”。“林皇帝”也是受够了炀帝百般折磨才希冀天下平安的，只可惜“太平”了九年，这位豪迈爽直，还有点头脑的“林皇帝”便向旧制度举起了白旗，倒是让李渊捡了个大便宜。不过也不能说后来的“盛唐”与“林皇帝”半毛钱关系没有，李世民父子还是从中吸取了不少教训的，“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尝闻”。

宋太宗赵光义通过“烛影斧声”从大哥手中“接过”皇权着实不易，也厌倦连年战乱、尔虞我诈，冥冥中他有了“匡”扶正义或“光”大正义的天性，索性把年号改成“太平兴国”，来创造一个天下太平的盛世。他先后使吴越的钱俶、南唐的陈洪进纳土归顺；接着又亲征北汉，结束了黄巢之乱以来五代十国90年的分裂局面。他还想收复辽、夏等地，还天下太平，就连编书也叫《太平御览》，可见他对“太平”的渴望到了何种地步。然而，“太平兴国”的愿望了9年便用不下去了，尽管后来改用了“雍熙”“端拱”“淳化”“至道”等年号，也未断停歇在北方与辽、西夏和在南方与交趾的战争，最终还是在淨化四年(993年)引发了王小波、李顺起义，让国家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。

在所有“太平”年(国)号的朝代，太平天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广东有个叫洪秀全的后生，熟读四书五经，却屡举不中，加之清政府腐败无能，西方列强大肆侵略，农民生活穷困潦倒，洪秀全痛斥天道不公，遂于1851年11日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，号于“太平天国”。能打出“太平”旗号的人，本质上也坏

“妈妈，妈妈，我要喝水。”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书中，望着女儿天真的小脸，我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。那一刻，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，我和我的孩子，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，是多么幸福啊！

书中对“信念”的描写也让我动容。

一位德军军官严刑拷打游击队员，仍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他没有停止鞭打，但问了一个让他疑惑不解的问题：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宁死也不背叛？游击队员回答：是信念。军官顿时感到心里一阵恐惧——虽然当时还是1943年，德军仍占上风，但他已预感到自己会失败。

是的，就是信念，支撑着苏联人最终战胜法西斯。战争初期德国装备精良，气焰嚣张，但苏联人民用血肉和精神筑起了长城。同样，咱们中国人，何尝不是依靠坚定的信念，最终击败了日本侵略者？

前段时间，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打动了许多人，因为它是这场大浩劫中普通人的真实经历。我的姥姥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，那时她还是个孩子，她记得大人带着她四处逃难，路上到处都是尸体；她看见女人们用锅灰把脸抹黑，那时她还不不懂是为什么。战后很多年，她一听到爆炸声仍会心惊胆战。直到后来跟着姥爷离开南京，来到六安，那些恐怖的噩梦才慢慢消散。

合上书，我一次又一次地想：到底什么时候，这个世界才能永远没有战争？

愿和平永存，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！

指尖刚刚碰到钢琴黑白键，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前奏一出来，1978年夏天的蝉鸣就立时响在耳边。那年我攥着恢复高考的录取通知书，刚踏进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琴房，没等喘口气就弹了遍《保卫黄河》。琴键的震动顺着指尖往心里钻，那会儿哪儿能想到，这曲子会陪我四十年，成了音乐路上离不了了的“老友”。

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，回头想想，我从弹钢琴的学生，到拉小提琴、指挥合唱，再到现在教孩子学音乐，一辈子都围着音乐转。说起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我不想只说它是“经典”，更想掏心窝子唠唠：在我这儿，它不是乐谱上冷冰冰的符号——拉琴时，它是贴在耳边的热乎劲儿；挥指挥棒时，它是能摸着的精神头；站在讲台上，它更是让孩子挨着历史的“音乐桥”。

1978年琴房：第一次懂了音符里的分量

刚进音乐学院，第一节专业课是沈阳音乐学院的许真教授教的。我以为会讲乐理、教指挥技巧，没想到他掏出张《黄河大合唱》黑胶唱片，往留声机里一放。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男高音一冲出来，我盯着谱上的“do、re、mi”，突然就醒过神——以前总觉得音符就是按顺序排的，那天才听出里头的情绪：《黄水谣》往下落的调子，像老百姓丢了家，胳膊软塌塌的；《保卫黄河》的切分音，是战士往战场跑的脚步声，连空拍都透着慌。

后来学院排合唱，我既在高声部唱歌，又进乐队拉小提琴。第一次跟乐队合《黄河颂》，琴弓刚搭弦，心里就发紧——不是怕拉错，是这旋律太沉，得轻轻拉才对得起里头的劲儿。拉到“我站在高山之巅，望黄河滚滚”，弦的震动顺着琴身传到胸口，眼眶一下就热了。以前唱歌只觉得调子激昂，这会儿拉着小提琴，才真“摸”到黄河的宽：绵长的旋律像河水绕山，柔里带刚，连呼吸都得跟着旋律起伏，不敢快半拍。

再后来排整版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我又唱又拉，还试着拿指挥棒。第一次指挥《黄河颂》，手心的汗把棒柄都泡湿了。等乐队铜管吹起引子，小提琴跟着起弓，看着台下同学眼里的光，我才懂：指挥不只是“数123”，是把拉琴的劲儿、唱歌憋在胸口的热血，都用手势递出去——得让小提琴拉出黄河的柔，定音鼓敲出咱民族的硬脊梁，让每个乐手都成“讲历史的人”。打这儿起，《黄河大合唱》在我心里就不是“练技巧的曲子”了，是得用心唱、用魂拉的“必修课”。

舞台与讲台：让老曲子活在当下

前些年跑演出，最难忘的是去六安干休所和金寨老区慰问。干休所礼堂里，坐满了穿旧军装的老军人，胸前的勋章亮闪闪的，手里攥着泛黄的老照片；到了金寨，台下既有扛过枪的抗战老兵，也有睁着大眼睛的孩子，满是期待。这两次我都又拉琴又指挥，《黄河大合唱》永远是台下最盼的“保留节目”。

在干休所那次，《黄河船夫曲》的前奏刚起，大提琴的厚调子裹着竹笛的号子声漫开，礼堂一下就静了——前排的老兵悄悄坐直，手跟着节奏拍腿，唱到《保卫黄河》，弦乐切分音像密集鼓点砸下来，一位老将军突然站起来，沙哑着嗓子跟唱：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！”眼泪顺着皱纹淌，手里的拐杖也轻轻晃。后来去金寨，演到这段，一位老兵攥着我的琴弓不肯放，手凉却握得极紧：“当年在战壕里，没乐器就用枪托打拍子，唱着这曲子就不怕了，今天听着，像又见战友冲前线。”

后台跟老人们聊天，我握琴弓的手越沉：原来这曲子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，是帮老人找青春的钥匙，是串民族记忆的线。咱唱音乐的，舞台不只有聚光灯的地方，得让这老曲子走到老百姓眼前，也让年轻人懂，让里头的精神在现在也活泛。

后来我办了艺术学校，特意把《黄河大合唱》放进教室里，从不让孩子照着谱子死唱、对着符号死拉。教小提琴时，先让他们听黄河浪声，再拉《黄河颂》：“不是拉够时长就行，得让弦上的音‘晃’起来，像浪头撞石头，有劲儿还得有回响。”教合唱时，让他们用乐器“学黄河说话”：古筝刮弦仿浪拍岸，二胡滑音学船工号子，打击乐轻重不一样，藏着战争的紧张和和平的金贵。孩子们还给《黄河对口曲》加了点现代节奏，让“张三哥，我问你”，00后、10后听着也不生分。

有个孩子歪着头问我：“李老师，现在不打仗，为啥拉琴、唱歌还这么‘冲’？”我没直接答，找了段老兵口述录音给他听，再把小提琴递过去：“你拉《黄河怨》的慢板，别光盯着音准，想想老家人丢了家、没了亲人，弦上的音得‘沉’下去，憋憋着哭。”他拉着拉着肩膀就抖了，抬头说：“李老师，我好像听见老家人在哭，手都不敢使劲按弦了。”那一刻我就知道，他透过琴弦摸着了历史了。对咱唱音乐的来说，传这曲子不是让孩子背歌词、记指法，是让他们记“不能忘的事”——那是咱民族的根啊。

坚守四十年：把接力棒传下去

现在我的钢琴上，还摆着1978年那本发黄的《黄河大合唱》乐谱，旁边是当年拉过的小提琴，琴身上的漆都磨亮了。乐谱扉页上，许真老师写的“音乐要为时代发声，为民族立心”，字还清清楚楚。四十年过去，我从琴房里跟着学的学生，变成了讲台上教孩子的老师，看着孩子举小提琴、握指挥棒，唱《保卫黄河》时眼里的光，就像看见当年攥着录取通知书，在琴房里紧张拉琴的自己。

今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，学校排了场《黄河大合唱》演出：小同学用童声唱《黄河船夫曲》，像讲老故事；大些的孩子拉琴、弹古筝，合奏《保卫黄河》，弦乐的激昂拌着民乐的醇厚，提气精神；还有孩子把改好的《黄河对口曲》唱给台下老兵听。等《保卫家乡！保卫黄河！》的歌声落了，老兵们颤巍巍鼓掌，眼里闪着泪，孩子也红了眼眶，演出来，一个孩子抱着小提琴拉我衣角：“老师，我以后也要拉着小提琴传这首歌，让更多人听见里头的劲儿。”

常有人问我：“四十年守着一首曲子，不腻吗？”我总拿起那把老小提琴，轻轻拨一下弦：“你听，这音里有黄河的浪、战士的喊、老百姓的盼，每次拉都像跟老辈人唠嗑，哪会腻？”对咱音乐人来说，《黄河大合唱》从来不是“过去的曲子”，是得用琴键、琴弦、指挥棒、讲台接着“续新调”的精神接力。

80年过去了，黄河水一直往东流，这曲子的旋律还是热的，以后我还会坐在钢琴前，拿着小提琴，把这曲子教给更多孩子——教他们读懂音符里的历史，教他们拉出旋律里的劲儿，教他们明白：咱接的不只是指挥棒，小提琴，是民族精神的接力棒。只要还有人用音乐传这份力量，咱中华民族的“黄河魂”，就永远在旋律里落着，在血脉里传着。

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、六安市李伟艺术学校校长、六安市五届政协委员）

我和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四十年

李伟

## 一位「立煌事变」经历者的流亡手记

梁远启 郑贤杰

1942年底，日寇窥见国民党安徽临时省会和第21集团军总部驻地立煌（今金寨县）防御疏松，遂策划组织偷袭，国民党守军望风而逃，机关和百姓纷纷逃难。1943年1月2日晚，日寇占领立煌县城金家寨，烧杀掳掠，凌辱妇女，撤离前又纵火焚烧金家寨，使一座临时省会化为一片废墟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立煌事变”。

近日，金寨县委史志室相关同志查阅资料时，偶然在《现代妇女》(1943年第1卷第5期)杂志上，发现刊登的一封信，信件详细记叙了1943年元月，安徽临时省会立煌（今金寨）沦陷，人们仓皇逃难的惨状。该信的发现，为研究“立煌事变”乃至研究金寨、安徽抗战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《现代妇女》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综合性妇女刊物，由中共南方局妇委直接领导。刊物于1943年1月在重庆创刊，1946年5月迁至上海继续出版，1949年3月被国民党查封，共出版13卷74期。《现代妇女》作为国统区内坚持出版时间较长的进步杂志，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中共领导且影响较大的妇女刊物之一。

杂志首先交待了信件作者的情况，原文如下：

本文作者陶冶女士，抗战后由上海来到内地，那时她真是位十足的上海小姐，时髦摩登不必说，且以幼失怙恃，处境的凄凉，形成她悲观的人生，但抗战的洪流慢慢她锻炼着她，变悲观柔弱的个性，成了一个积极坚强的战士女性，同时弱不禁风的身体，也壮健魁梧了。两年前来，她随某个剧团从重庆徒步跋涉到立煌。在立煌一个机关里服务，这是她最近的来信，描写立煌事变时情况颇详，虽以邮路不便，过时已久，但也正因为战时混乱，此类材料不可多得，特发表在这里，并且从这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新型女性战斗生活的一斑。

根据信件内容分析，作者陶冶先是随逃难队伍撤退到安徽阜阳，在阜阳住了一个月后，由友人相助，步行一千余里，到达北方某座小县城，准备在那里求职谋生。这封信便是陶冶在那个县城写作的，写信时间是1943年3月31日，距“立煌事变”已近三个月了。以下信件原文：XX先生(注：杂志刊登的原文如此)：

立煌事变，你一定很为我着急吧，幸而我已平安到达此地，这是首先可以告慰你的。那天恰巧是元旦，沉浸在欢笑与逸乐中的立煌，市民正在忙着热烈庆祝，然而战争毕竟是残酷的，下午的时候传来敌人攻来的消息，傍晚时已纷纷在逃难了。多少人拖儿带女，多少人哭泣呻吟，尤其是妇女们，简直惊吓得手足无措，就是平时舒舒服服的阔太太和娇小姐们也只得用两条腿载着自己走，因为这时轿子和挑夫是雇不到的，不论你出多少代价。贵重的东西人们也弃之如蔽屣，惊恐与慌乱的情形和上午的欢乐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我于仓促中跟了一个战斗团体一起撤退，平时我就穿着臃肿的棉军服，又圆又笨一个十足的丘八相，这时加上一件褪了色的破棉大衣，背上揸了一个行军行李，心境有些迷茫，因为这种遭遇在我还是初次。XX先生，两年的分离，我的生活起了多么大的变化，而我整个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想在我给你的信件中，你可以看出我的变化来。

我们撤退的时间是在半夜，天色严寒，天空墨黑，人们从各个山头向一条路上挤，黑暗被灯笼划破，这时才看得见逃难的行列中各种姿势，有的人身背手托，有的人肩挑行李，都灰白着脸露出恐惧焦急的表情来，更有前呼后应的哨声，XXXXXXXX(注：此处为杂志省略、无法辨明的几个字，下同)一群怕掉了联络，口传着XXXXXXXXXX又结伴在一起，谁都回到XXXXXXXXXXXX离开危险可以远一点。然而争执的结果反而大家都走不快，只好干着急，因为天一亮就看见敌机的光线。一直到天亮后不敢停不下来，吃饭时炮声愈来愈响了，只得放下饭碗赶紧又走，遇到敌机，大家东奔西窜地躲，这时的中心紧张得像一张拉紧了弦，忘了疲惫，忘了一切。傍晚晚饭后附近的街上起大火，顿时惨叫声从四面袭来，老百姓都惊恐地迷了方向，询问着到别处去的路径，我们不敢停声，在黑暗中爬山越岭，山路崎岖，又窄又滑，一不小心，就会滚到深沟里去，听到别人跌下去的呻吟声，不禁使我战栗。直到半夜才算得着初次的休息，最初两天我们始终离敌人四五十里路，有时我们简直不知道往哪里逃才好，因为这时听说四周都有敌人。好不容易经过七天的艰苦跋涉，才于元月八日到达阜阳，这时疲劳得不能动弹，脚走痛了，衣服也穿破了，每个人的脸都显得苍白、瘦削，我们需要休息，此外什么也顾不了，这种经历，在当时的确不是好受的滋味，不过过后也觉有趣，以为我唾弃的止水似的生活，总算起了了一点点的波紋。

从立煌逃出来的人大都在阜阳遇到，各人有各人的特殊经过，可是同样的都是经过一番艰难困苦。不久，立煌虽克复，可是我早就厌倦那里的工作和生活，对那到处都显得凄凉的闲适竟显尤其感觉不顺眼。而且劫后的立煌听说房屋被焚烧，粮食和盐被抛入河里，让山洪冲走，物价比以前高出一倍多，还样样缺货。我不愿再回去，所以在阜阳住了一个月，由友人的相助，才于上月到达此地，统计这次步行又是一千里。

这里是一个平原的小县城，可是我们的地方是离城15里的一个更小的村庄，一切生活习惯都是北方风味。气候很不好，时常有风沙，刮起来真使人害怕。住的是土屋，没有窗子，吃的是馍馍和面汤，生活很简陋。老百姓的服装都很古板，小脚遍地都是，最可惨的是这里早灾，居民都饿得面黄肌瘦，形容枯槁，郊外的树皮都被剥得光光的，充作粮食，这种种现象也是我以前所未能看到的。本来我准备在某日去报社找工作，谁知这里正在考虑用不用女职员的问题，用“需要研究”的借口来代替拒绝，这真使我气死，甚至于受辱似的难堪。女子在这社会里就只能受种苛也有此理的不过吗？XX先生，我恨不得破口大骂一顿！暂时没有办法，也许在这里教书，可这不是长久之计，等旅费筹到时准备回后方去，时间大概在今年秋天，请你多告诉我后方的情形。

你近来怎么样？工作如何？我常念你们。余荣后敬。敬祝安康！

## 张学文：倒在国民党枪口下的抗日名将

夏书阁

前不久，笔者利用休息时间赴贵州独山县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参观，在纪念国共两党抗日英雄的“万魂墙”上，看到了一位安徽籍卓著烈士的匾牌：张学文，1915年出生，安徽霍邱人，1931年参加红军，曾任红军团长，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游击支队副队长，1943年7月24日在安徽盛家桥牺牲。

据说，这是全国唯一一家对国共两党抗日英雄记录最全的纪念馆。

据查阅相关资料和到多个部门认真考证，张学文牺牲时所在部队是新四军第七师。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后，根据党中央命令，新四军第七师正式宣布建立，张鼎臣任师长，曾希圣任政委。这支部队是由“皖南事变”突围部队、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和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三支部队编组而成，下辖四个团和几个独立大队，约2000人，到1943年初，部队已发展到6000多人。

张学文1931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，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多次反“围剿”作战，后随军北上入川，参加创建川陕苏军根据地斗争，并担任长征，曾任红军团长，功勋卓著。抗战初期，张学文奉命由延安派回安徽，先后任无为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、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兼第三大队大队长。1940年转入淮南抗日根据地，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十三团团长等职。1943年春调回皖中抗日根据地，任新四军第七师巢湖游击支队副支队长。

1943年三四月间，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决定对新四军第七师巢无中心

根据地两次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，妄图一举消灭第七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。

在两次反扫荡斗争中，第七师各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，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，缴获步枪500多支、轻重机枪14挺，粉碎了日寇的万人大“扫荡”，取得反扫荡斗争的伟大胜利，张学文等众多将士荣立战功。

日寇两次“扫荡”，妄图消灭我新四军第七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阴谋失败了，又玩弄新花招，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，心照不宣地搞日蒋联合军事行动。

1943年7月24日，日寇突然从白湖的两端黄姑垭、盛家桥两个据点撤退，使我巢无中心根据地暴露在大别山国民党反共顽固军面前，让桂系顽军向我疯狂进攻。在这次战斗中，第七师一部损失惨重，张学文也壮烈牺牲，年仅28岁。张学文，一位很早参加红军，曾经先后担任过多个要职的我军抗日名将，多次打敗日军，为国雪耻，最后竟倒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。

“北有卢沟桥，南有深河桥”。我们一行吊唁者，立于“万魂墙”前，向国共两党抗日英烈们鞠了三躬，并对着回音壁高喊：向抗日英雄们致敬！喊声在喀斯特地貌里的山谷中久久回荡……

“愿以我血献后土，换得神州永太平。”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愿英雄不朽！

## 天下太平

金从华

不到哪去，更何况他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就是想建立一个“有田同耕，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使，无处不均匀，无处不保暖”的理想社会呢？然而洪秀全终究是一个“教主”，而非什么“天王”，一支近百万之众的起义军，因“内讧”终不敌“湘军”“淮军”的围追堵截，最后于1864年7月19日被曾国藩开了天京的“太平门”，至此，历经了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以惨败而告终。14年的战乱，纵横了18个省，虽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，却是以1亿多人口消亡为代价的，细细一想，如此“太平”不要也罢。

应该说祈盼天下太平是乱世之中普通人与生俱来的想法。人们起个“太平”的名字，希望自己一生平安，也很正常。

唐朝有个叫李令月的女子，可能知道的人很少，但要说她的常用名可谓家喻户晓，她就是太平公主。她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女小兒，取名太平公主，可见李治的用心良苦。太平公主16岁时，李治要公主“名副其实”去吐蕃和亲，求得一隅的太平，但遭到武氏的反对。就是这个太平公主从此让长安城不太平起来，仅是她的几段婚姻就让数人的脑袋搬了家，她先是参与诛杀张易之兄弟，接着联合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，诛杀韦氏集团，然后广树党羽，权倾朝野，富可敌国，把唐朝深宫内外搞得乌烟瘴气。开元元元年(713年)，太平公主又准备谋反闹事，最后被唐玄宗擒获赐死，李三郎总算过了几天太平的日子。

其实对太平的企盼不只是王侯将相，黎民百姓也有，也不只是华夏大地，西方世界也是。麦哲伦起名的太平洋，香港的太平山，石家庄的太平河，赣州的太平桥，京山桃花被称作太平花，银杏树被称为太平树，北京曾有个太平湖，等等，都是很好的例证。

太平，作为地名，如太平组、太平村(队)、太平乡(镇)、太平县等更是比比皆是。

历史山西有过两个太平县。一个是北齐天宝七年(556年)设置的太平县，位于

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霍山县入党第一人，创办进步刊物《醒狮》宣传革命思想，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毕业后奉命回大别山区开展地下工作，1929年冬，参与组织领导著名的西镇暴动，组建安徽第一支正规红军，1931年冬不幸被捕，残酷的敌人用尽酷刑后，又剥光他的衣服，用冰水浇在他的身上，然而伍淑和鄙视淫威，不屈不挠，敌人最终将其杀害于太平贩洪湾河边。

伍淑和临刑前吟诗一首：赤膊条条任去留，丈夫与世何所求；窃思民意摧残尽，愿把身躯易自由。字字铿锵，句句震撼，伍淑和真丈夫也，他所盼望的“自由”，其实就是今天的天下太平。那么今天的太平盛世就是伍淑和们用血和泪用生命之换来的“自由”，有如此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之人，何愁天下不太平？

如今的太平，绿水青山，屋舍俨然，马路纵横，各色轿车穿梭于山间地头，傍晚的村口响起曼妙的音乐，一支支广场舞队伍闪亮登场，大妈们扭动着身躯，唱着美好，释放着一天的喜悦。人们在歌余饭后，在庆祝一个又一个丰收之际，总是忘不了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有大别山药王”之称的何云峰。

何云峰1933年生于霍山县太平畈乡王家店一个贫农家庭，童年时就开始上山挖草药，他从1970年开始就关注消失几百年的霍山石斛，他用3年时间找到了一株梦寐以求的霍山石斛，又用8年时间将野生石斛变家种试验成功，他还用了5年时间恢复失传千年的霍山石斛“龙头凤尾”炮制方法，且毫无保留地把这些技艺无偿地传授给乡邻，霍山石斛成了太平畈乡村振兴和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。何云峰，这个霍山石斛非遗传承人，不愧为“霍山石斛之父”。如今霍山从事石斛产业的有3万多人，占全县总人口的12%，石斛加工企业2672家，产值达67亿元，占全县GDP的30%，太平畈成了“中国石斛之乡”。

一个人，一棵草，一辈子，一个产业，一片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，有如此敬业奉献、舍小家顾大家之人，何愁天下不平安？

清平世界也好，海晏河清也罢，都离不开一代人的抛头颅洒热血，更离不开旧制度，当年的“窑洞对”破解了历史的“周期率”，也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执着追求、无私奉献，才有了今天的国泰民安，天下太平。